

# 不義遺址之人權教育—— 德國達豪集中營的保存紀念與導覽解說

陳佳利<sup>1</sup>

## 摘要

近年來，隨著人權博物館與人權博物館學之興起，如何透過博物館的展覽與教育活動，引領觀眾認識歷史上重大的違反人權事件，達到人權教育的目標，成為博物館的重要任務。其中，做為納粹罪行現場的「真實可信之場所」，德國境內保留不少集中營遺址改為博物館或紀念園區，被視為困難遺產或不義遺址，吸引了不少學校團體與國際觀光客參觀。究竟，於前德國納粹集中營所成立的紀念園區，其教育理念與活動方案為何？又如何透過導覽與教育活動，對觀眾述說大屠殺歷史並連結人權教育理念？

本文以納粹政權於 1933 年設立的第一個集中營，整修成立的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為研究個案，介紹其園區的保存與展覽規劃，並透過線上訪談與線上導覽內容分析，探討其教育活動規劃與導覽解說內涵。研究指出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為學校舉辦的工作坊，應用照片與漫畫於導覽活動中，成功連結學生對相關課題的興趣與討論。而線上導覽內容雖然較少連結到當代人權課題，但以受難者為主體的各個主題導覽內容，有助於揭開這段複雜歷史的各個面向與角色，包括加害者體制的形成以及受難者的抵抗與能動性；部分導覽主題強調受難者跨國界之互助合作與解放後對司法正義的堅持，鼓舞觀眾未來對抗不義與違反人權事件。另外，各種受忽視與邊緣的聲音，如女性性奴隸與同性戀者，也透過研究與導覽逐漸呈現在觀眾面前，有助於觀眾連結這些屬於邊緣的、多元性別的族群與團體，在歷史與當代社會所遭遇的相似處境與歧視，提供反思當代人權課題的重要養份。

關鍵詞：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納粹大屠殺、集中營導覽、集中營展示、博物館與人權教育

---

<sup>1</sup> E-mail: chiali21@hotmail.com

## 前言

近年來，隨著人權博物館與人權博物館學之興起，如何透過博物館的資源與機制，引領觀眾認識歷史上重大的違反人權事件，並透過教育政策的擬定與方案規劃，達到人權教育的目標，成為博物館的重要任務。Carter 和 Orange (2012) 提出人權博物館學應致力於實現社會正義，其中，做為納粹罪行現場的「真實可信之場所」(authentic sites) (林蕙玟，2010)，德國與波蘭境內保留不少集中營遺址改為博物館或紀念園區，被視為困難遺產 (Macdonald, 2009) 或不義遺址。集中營博物館透過建築遺址與展覽，呈現前德國納粹政權如何迫害猶太人<sup>2</sup>、政治犯與少數族群之歷程，以及受害者的生活樣貌，吸引了不少學校團體與國際觀光客參觀，形成所謂的黑暗觀光 (Lennon and Foley, 2010)。在研究方面，除了集中營遺址的保存、建築及相關倖存者口述史等課題外 (e.g. White, 1998; Marcuse, 2001; Saidel, 2004; Mitchell, 2018)，近年來也開始有學者分析集中營觀眾參觀經驗及國族認同 (Macdonald, 2009; 劉仁章，2017)，或從轉型正義的課題，以紀念日、紀念碑和集中營園區等案例，分析德國的紀念工程與歷史記憶再現 (花亦芬，2016)。

雖然陸續有相關的研究論文，但卻少有學者針對此類博物館的教育活動進行深入的研究。究竟，於前德國納粹集中營所成立的博物館及紀念園區，其教育理念與策略方案為何？又如何透過導覽，對觀眾敘說納粹大屠殺歷史並連結人權教育理

念？在臺灣，隨著國家人權館的成立，如何保存不義遺址並規劃相關的展示與教育活動，提供社會大眾和學校團體認識歷史並且進行人權教育，已經成為重要的課題，藉由德國集中營博物館教育活動研究，可以提供重要的參照案例。以下將簡介德國納粹集中營的發展脈絡與分期，並以納粹政權於 1933 年在慕尼黑郊區設立的第一個集中營所成立的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 Site) 為例，介紹其博物館成立與展覽規劃，並分析其導覽解說內涵與手法，反思不義遺址做為人權教育基地的潛能。

## 德國納粹集中營發展脈絡與分期

Wachsmann (2010) 及花亦芬 (2016) 整理納粹集中營的發展概況，指出納粹政權於 1933 年至 1945 年間，在歐陸各地設立高達 15,000 座、大小規模與定位不一的集中營，其中包括許多奴工營和附屬的小營區。Wachsmann (2010) 的研究指出，納粹政權一開始設立集中營的目的並非在於滅絕猶太人，而是隔離政治犯；到了戰爭後期，才開始將集中營做為滅絕猶太人之用。Schweber 和 Findling (2007) 指出納粹政權所設立的集中營可分為以下四種類型，分別為過渡營 (transition camp)、勞動營 (labor camps)、集中營 (concentration camps) 及死亡營 (death camps)。其中死亡營，又稱滅絕營 (extermination camp)，是納粹執政後期發展出來的集中營類型；而有些集中營兼具上述幾種類型，如奧斯維辛集中營 (Auschwitz) 共有 3 個營區，分

<sup>2</sup> 根據雷敦蘇導讀漢娜·鄂蘭《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施亦如譯，2013: 3) 一文指出：「基督新教傳教士瓦特·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於 1817 年來華，1837 年曾編纂一本中英辭典，其中採用犬部的『猶』字指稱猶太人，原因是他認為猶太人並非善類，而且中國古代慣以『犬』部的字稱呼周邊的蠻族，如北方的狄族，因此麥都思刻意不使用天主教原有的『如得亞 (Judah/Jew)』，而選擇犬部的『猶太』，帶有貶低意味。」針對麥都思的觀點，當代許多學者都刻意採用「尤太」一詞以示反對，本文也採取「尤太」一詞來取代「猶太」。

別具有集中營、勞動營及死亡營 3 種不同的功能與類型。對於上述的區分，Sofsky (1999: 7) 就犀利地批評，納粹政權區分勞動營和死亡營，只是遮掩勞動營的本質也是一種死亡營，因為多數囚犯都因為過度勞動而身體虛弱，被送回死亡營中的毒氣室。

回顧前德國納粹政權所設立的集中營發展歷程，Wachsmann (2010) 將其分為 6 期：

### 一、早期 (The early camps, 1933-1934)

這期間利用許多既有的建築與監獄做為集中營，主要是監禁左派人士及工人運動份子，以打壓反對勢力，規模相對小，也有較多的受難者出獄生還。1933 年，納粹政權於慕尼黑郊區改建了荒廢的軍火工廠，設立了第一個集中營——達豪集中營。達豪集中營的經營管理及空間設計，也成為其他集中營的範本。

### 二、形成期 (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1934-1937)

隨著興勒 (Heinrich Himmler) 的崛起與掌握整個蓋世太保警政系統，他主張於郊區、民眾不可見的區域興建集中營，也受到希特勒的支持，包括 1936 年設立柏林附近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Sachsenhausen)，及 1937 年在威瑪附近設立的布亨瓦德集中營 (Buchenwald)，1937 至 1938 年間也重新修建達豪集中營。這時期的集中營就像個小型的恐怖城市 (city of terror)，內部有營舍、瞭望塔以及通電的鐵絲網，都於此期間成形。

### 三、擴張期 (Expansion, 1937-1939)

隨著戰爭即將來臨，納粹政權逮捕更多的社會邊緣人 (social outsider)。1938 年 11 月 9 日發生水晶之夜後，納粹政權開始對猶太人、辛提和羅姆人及同性戀者進行

大規模的種族迫害，主要的用意在逼迫猶太人移民、離開德國。因此，興勒在德國東邊興建更多的集中營，包括 1938 年在捷克邊境設立的 Flossenbürg 集中營、在奧地利北邊設立的茂特豪森集中營 (Mauthausen)，以及德國柏林北邊設立專門囚禁女性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 (Ravensbrück)。

### 四、戰爭與殺戮 (War and mass killing, 1939-1941)

隨著戰爭的展開，納粹政權逮捕人數急速增加，集中營也人滿為患。因此，興勒於 1940 年間，在漢堡附近設立 Neuen-gamme 集中營、在波蘭 Krakow 郊區設立奧斯維辛集中營 (Auschwitz)。1941 年，又於 Lublin 設立 Majdanek 集中營，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附近增設比克瑙集中營 (Birkenau) 等。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一開始的設立是為了鎮壓波蘭境內的反對人士及政治犯，直到 1941 年到 1942 年間，猶太大屠殺 (Holocaust) 才成為國家政策，使得奧斯維辛集中營成為屠殺猶太人的重鎮。

### 五、經濟與滅絕 (Economics and extermination, 1942-1944)

1942 年，興勒對集中營系統規劃了新的方向，希望整合到新的經濟與行政體系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Main Office)。此階段，集中營人數大幅上升，並採取屠殺與勞動生產兩項策略，提供集中營內青壯人力到鄰近的德國企業中進行勞動生產，並針對老弱婦孺以毒氣室進行屠殺，此階段也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僅就 1944 年 5 月至 7 月，就有 47 萬來自東歐匈牙利的猶太人被送到集中營，Majdanek 集中營與奧斯維辛集中營也成為兩大死亡集中營。奧斯維辛集中營此時的規模也擴大到 3 個營區並分為以下類型：奧斯維辛集中營、比克瑙滅絕營以及

Monowitz 勞動營。根據紀錄，1943 年，約有 224,000 人被登記於集中營中服刑，其中就有 74,000 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

## 六、高峰與瓦解 (Climax and collapse, 1944-1945)

隨著納粹政權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集中營的規模卻越來越大，被遣送到集中營的人數也倍增。在聯軍解放集中營前，納粹黨衛軍為了掩飾罪行，將靠近德國邊境的集中營囚犯，大規模移轉到德國境內的集中營，奧斯維辛集中營內大部分的受難者因此踏上死亡行軍之路，並餓死或凍死於途中。例如，1945 年 1 月 18 日，共有 3,000 位受難者從比克瑙滅絕營出發到 500 公里外的集中營，但卻只有 280 人到達目的地。

在納粹集中營的發展與迫害對象上，Sofsky (1999) 及 Wachsmann (2010) 指出，集中營一開始用來迫害政治異己，如反納粹份子及共產黨，並以男性為主；但隨著納粹政權對歐洲各國的佔領而擴大迫害的規模，並將焦點從政治迫害轉而成為種族迫害，如猶太人；任何納粹視為反社會 (asocial) 的份子，如同性戀者與妓女等，也都受到迫害並監禁於集中營。女性人數也從一開始的少數，直到 1945 年，約有 28% 的集中營囚犯為女性，並有上千名的兒童。

## 面臨死亡與重建的建築遺址

觀眾參觀集中營博物館，經常以參加導覽團的方式進行<sup>3</sup>，其中，造訪納粹大

屠殺的真實可信的場域，以及相關的歷史建築及園區遺址成為最重要的經驗之一；林蕙玟 (2010: 6) 指出真實可信的場所是：「在創傷事件中處於該事件發生之時的現場或所在地」，而這樣的場域與其他非事件發生的中立紀念場域不同，往往成為回憶的起點。因此，與集中營建築遺址相遇，往往帶給觀眾強烈的情感的共鳴，也蘊含著集體記憶 (cosmopolitan memory) 與各種資訊；使得集中營遺址不只呈現恐怖的屠殺過往，也可能帶來對當代種族主義的反思。

首先，集中營的營建過程與基地形式，蘊含了納粹政權的意識型態。Mitchell (2018) 認為集中營的建築與遺址本身就是重要的物質證據，其設計過程不只充滿納粹政權的意識型態，也成為展示這段創傷歷史的重要展品。在空間的規劃上，集中營以區隔與懲訓為主要設計理念，分為受難者居住的營舍與其他的工作區域，如醫院、廚房、裁縫室、木工區等，並配置了嚴密的監控系統，除了以層層通電的鐵絲網及圍籬來隔絕外在世界，也以監視塔來監視囚犯。若再仔細檢視上述空間分佈，可以發現空間的分配也體現了納粹種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以達豪集中營為例，距離廚房與各個工作空間較近且方便的營舍，會優先分配給來自西歐的政治犯與反社會份子，而來自東歐的政治犯、猶太人及蘇聯的戰俘，則居住在相對較為偏遠的營舍；此外，集中營中的妓院則被安排在不起眼的角落，遮掩納粹反娼妓又設立集中營妓院的矛盾事實<sup>4</sup>。

除了上述「生活區域」外，集中營中

<sup>3</sup> 以奧斯維辛及比克瑙紀念博物館為例，該館主張不收門票但要求觀眾必須付費參加導覽團體，以瞭解該營區所發生的大屠殺事件與受難者創傷；而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除了定時導覽，也接受學校團體預約參加導覽。

<sup>4</sup> 根據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線上導覽內容，得知受難者會因國籍與種族而有不同的營舍分配，而達豪集中營妓院遺址現已不存在，目前只有在該地設立指標說明，詳見官方臉書線上導覽，網址請參考註腳 11。

還規劃了「死亡區域」(zone of death)，並設有毒氣室、焚屍爐和掩埋場等，其中毒氣室與焚屍爐<sup>5</sup>是比鄰設立的，以實踐納粹政權有效率且符合經濟原則，進行大量屠殺猶太人的政策；這些死亡區域或是設立在集中營區外，或位於集中營的邊緣區域，如達豪集中營的毒氣室與焚屍爐就設立在整個營區左上方隱密的角落（如圖 2 標示之第 13 區），除了以鐵絲隔離讓囚犯無法窺視，甚至種滿花卉以顯得一片祥和且無害的模樣，來掩飾其中發生的滔天罪行 (Sofsky, 1999)。Young (1998) 的研究指出，雖然納粹政權在達豪集中營中興建德國境內唯一的毒氣室和焚屍爐，但與其他集中營的毒氣室不同，達豪集中營設立毒氣室是做為實驗與其他集中營範本用，而未被應用於大屠殺，而是處理因為飢餓、疾病或槍決死亡的受難者。這些死亡機制與空間，在 1945 年納粹軍隊撤退之際，除了達豪集中營的毒氣室與焚屍爐來不及摧毀外，多數都被摧毀，只留下部分殘留遺跡，成為納粹企圖掩埋罪行的見證。

二戰之後，因為政治與社會因素，做為「真實可信」場域的集中營博物館，也面臨了遺址保存與多元歷史詮釋等問題。Lennon 和 Foley (2010) 指出，因為納粹興建集中營時，並未計劃永久保留這些建築物，因此缺乏嚴謹的建築工法與技術，使得現今許多遺址都面臨嚴重損毀的狀況；另外，戰後的政治社會情勢，也造成許多集中營原始建築物損毀，並承載了不同的歷史事件。例如，Kaminsky (2019: 132-136) 就指出納粹政權設立在柏林附近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於 1945 至 1950 年間，成為蘇聯祕密警察關押及凌虐納粹黨衛軍

及其青年組織成員、一般罪犯和政治犯的第七號特別集中營 (Special Camp No.7)，共約有 6 萬名未經正式審訊的囚犯被關押於此，並有一萬兩千人死於疾病或營養不良，使得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先後背負了極右的納粹政權，與極左的蘇聯政權迫害人權的雙重歷史 (double history)，而這兩段違反人權的歷史，直到 21 世紀才開始以分區的方式，分別在不同的建築空間中以展覽呈現。而達豪集中營二戰後則是先為美軍所使用，做為關押納粹黨衛軍及審判之用，1948 年後交還給西德政府，並為了接收大量自東歐回國的德國難民，而被改建成較為舒適的房舍 (Marcuse, 2001)，此點也讓受難者居住的原始營舍，已經不復存在於此。因此，Lennon 和 Foley (2010) 認為，死亡之地也正面臨自身的死亡 (the place of death is itself dying)，而部分重建的建築物並未明顯標示，經常誤導觀眾以為園區的建築物是完全原汁原味的保存<sup>6</sup>；在各種歷史遺址的環繞下，令人產生集中營似乎如實地再現「真實」的印象，彷彿除了時間的流逝，什麼都沒有改變 (Young, 1998)。

## 遺忘或紀念？達豪集中營的保存與展覽

戰後集中營的保存與敘事、紀念對象，也因集中營的特性以及各國的政治社會脈絡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並以 1990 年代初期東西德合併及前蘇聯解體為重大的分水嶺。其中，在東德及波蘭境內的集中營在前蘇聯解體前，多在政府的支持下，於二次大戰後立即被保留並成立紀念館或

<sup>5</sup> 2020 年 10 月 29 日，研究者於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學術雙年研討會中發表〈抵抗、回憶與認同：再現納粹大屠殺女性受難者的聲音與經驗〉，經與會者提問將 crematorium 翻譯為焚化爐一詞，有物化受難者嫌疑，故本文翻譯一律採取焚屍爐一詞。

<sup>6</sup> 例如，目前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中重建的受難者營區，展版表題旁有標示 reconstruction 一詞，但對於沒有閱讀展版習慣的觀眾，可能不會注意到該區整體建物都是重建的。

博物館，用來控訴法西斯的極右政權並彰顯共產黨的意識型態（陳佳利，2007）。而在西德境內的集中營，都是在倖存者的努力下才得以保存（Marcuse, 2001），以有限的展覽內容呈現納粹政權違反人權的歷史。這個階段除了導覽之外，也鮮少有其他教育活動規劃，直到 1990 年代，隨著政治局勢改變以及國際觀光興起，各個集中營博物館才開始大規模地更新展示，並設立教育中心，為學校及團體提供歷史與人權教育的課程與工作坊。

而本研究的個案達豪集中營，於 1933 年在慕尼黑近郊成立，為納粹政權實驗集中營的場域，其運作模式成為後來許多集中營的典範，也是納粹政權用來培訓集中營管理人才及宣傳其成效的地方（李金瑾，2015），被稱為「暴力的學校」（school of violence）<sup>7</sup>。達豪集中營以恐怖（terror）為其管理模式核心，其運作模式為其他集中營所效法，如囚犯的分類、勞動做為恐怖隔離的工具、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懲罰，例如對兵變或企圖逃離者，一律採取軍事法懲罰（Sofsky, 1999）。Young (1998) 指出，做為納粹興建的第一個集中營，達豪集中營主要是用來關押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德國政治犯和反納粹的教會人

士，因此，一開始有許多知名的政治人物、宗教領袖、學者和藝術家都被囚禁於此。1941 年，納粹政權提出最終方案（the Final Solution），並於 1942 年萬湖會議決議採取大規模屠殺猶太人後，達豪集中營才成為囚禁猶太人以及蘇聯軍俘虜的集中營，並在距離集中營兩公里外的地方（圖 1），對蘇聯軍俘虜進行屠殺。直到美國部隊於 1945 年 4 月 29 日解放集中營，共計約有 20 萬名囚犯曾被囚禁於此，並計有 41,500 位受難者於此遇害。

在保存上，相對於前蘇聯政權積極地保留位於東德與東歐境內的集中營，以突顯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邪惡，西德政府一開始對保留納粹的歷史罪行，則顯得消極與被動，保存集中營甚至引發地方居民的反彈與抵制。此外，如前述，二戰後達豪集中營先後做為納粹罪犯監獄及遣返回國的德國難民營，收容了近五千多名的難民居住於此，並拆除原有的鐵絲網與部分營舍，興建宜人居住的住宅（Marcuse, 2001），而這些過程都影響了達豪集中營的保存與紀念方式。

早期達豪集中營的展示規劃與保存，是在三股力量——地方居民、倖存者及解救者（美軍）中拉扯，而各自也有不同的



圖 1. 距離達豪集中營兩公里外的屠殺地（圖片來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授權提供）

<sup>7</sup> 參考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網頁 Homepage | KZ Gedenkstätte Dachau (kz-gedenkstaette-dachau.de)（瀏覽日期：2021/08/09）。

記憶策略與版圖。根據 Young (1993: 63) 及 Schimal (2020) 的研究，美軍最早委託受難者在營區中設置了簡單的展覽以展示納粹的暴行，並以真人大小的人物意象來呈現受難者如何被納粹虐待刑求，如囚犯被電死在鐵柵欄上，或是守衛集中營軍犬撲向囚犯的照片等等<sup>8</sup>，這樣的展示內容激怒了當地的居民並提出抗議，認為該展覽不僅品味低下、充滿挑釁，甚至危害國際關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達豪集中營因為曾經關押不少宗教領袖與人士，因此，戰後也有許多宗教團體在園區內設立各種紀念柱與小教堂（如圖 2 標示之第 16-19 區），以紀念於此罹難的宗教人士（李金瑾，2015: 54-55）。

1955 年，受難者團體有感於集中營保存狀況差，提出在營區內設置紀念空

間，以紀念達豪集中營解放 10 週年，也遭到地方政府及公民團體的強烈反對，反對的聲音甚至認為集中營中的焚屍爐和毒氣室是美軍新設立的，以做為詆毀德國的宣傳，並主張拆毀集中營以恢復美麗的地景。面臨集中營遺址的保存岌岌可危下，受難者團體組成的國際達豪集中營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amp Committee)，也改為國際達豪委員會 (th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Dachau，以下簡稱 CID)，在美軍的支持下，於焚屍爐區設立了小型的博物館，透過展示說明文字及照片、文物與制服等，簡要地描述達豪集中營的歷史。

1965 年，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才在倖存者主導及推動下正式設立，主要的紀念對象為政治犯（花亦芬，2016），並委託專業團隊設立常設展，奠定今日園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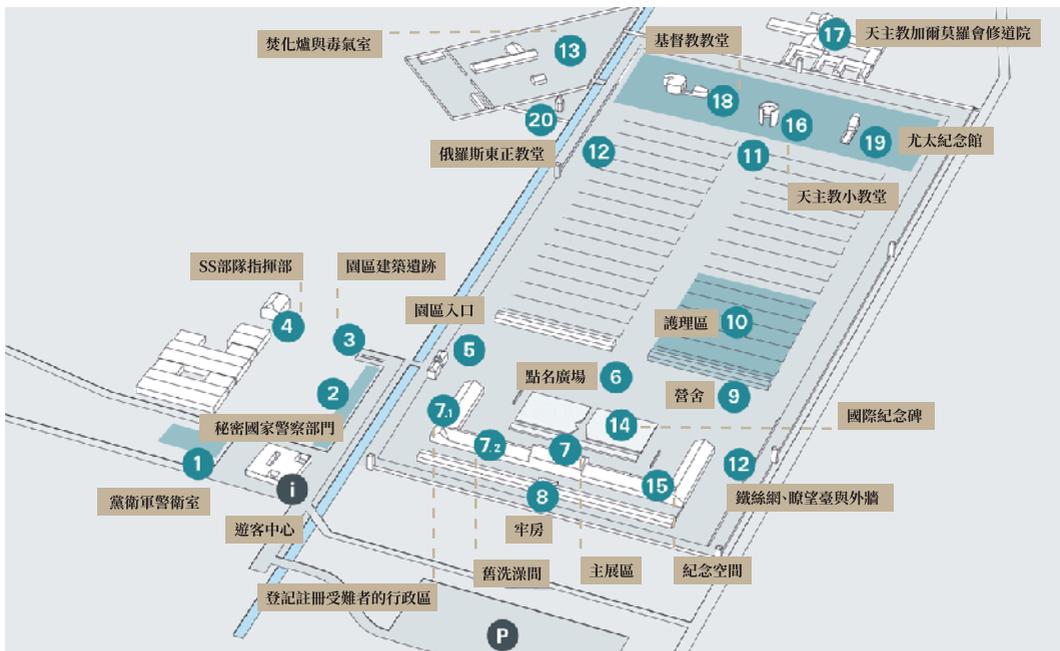


圖 2. 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建築空間分佈圖（圖片來源／中文圖說由陳佳利、葉家好參考園區官網介紹<sup>9</sup>與李金瑾 (2015) 研究進行標注）

<sup>8</sup> 此時的詳細展覽內容，也可參見李金瑾 (2015) 的碩士論文，頁：45-46。

<sup>9</sup> 圖 2 截取自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官方網站，<https://www.kz-gedenkstaette-dachau.de/en/historical-site/virtual-tour/>（瀏覽日期：2022/01/08）。

覽分區的基礎(圖2)(Schimal, 2020)<sup>10</sup>。1968年,由Nandor Glid設計的國際紀念碑於主展區前的點名廣場旁落成,成為觀眾必定參訪的景點(圖3)。身為南斯拉夫的猶太人,Glid父母於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遇害;而他所設計的紀念雕塑,透過人物被扭曲、壓抑的肢體語言,及其手指與腳趾以形似納粹所架設的通電鐵絲網般張開的樣貌呈現,讓觀眾能以身體感受受難者的苦痛(Goh, 2018)。另外,雕塑中張口仰天長嘯卻發不出聲音的人物姿態,Young (1993: 66)認為這樣的沉默之聲,象徵著雕塑家自身、受難者以及參觀觀眾的吶喊。



圖3. Nandor Glid設計的國際紀念碑落成,成為觀眾必定參訪的景點。(圖片來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授權提供)

現今的常設展則於2003年開幕,由巴伐利亞歷史學會(House of Bavarian History)負責,並在CID委員會及專家學者參與下完成。根據官方網頁介紹<sup>11</sup>,博物館常設展主展區設立原集中營用來登記註冊受難者的行政區(Maintenance Building)(圖4),展覽主題為「囚犯之路」(Path of the Prisoners),內容聚焦在受難者的命運,呈現受難者如何來到集中營、在集中營的生活,以及朝向死亡或倖存之路;整體設計以展板呈現歷史背景,並用掛幅來呈現受難者個人的經歷(圖5)。在歷史敘事上,展覽採用捷克歷史學家,也是集中營倖存者Stanislav Zámečník



圖4. 博物館常設展主展區設立原集中營用來登記註冊受難者的行政區(圖片來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授權提供)



圖5. 常設展展覽主題為「囚犯之路」,使用掛幅來呈現受難者個人的經歷。(圖片來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授權提供)

<sup>10</sup> 1965年設置的常設展,詳見Schimal(2020)的文章分析與李金瑾(2015: 52-54)的碩士論文中的介紹。

<sup>11</sup> 展覽介紹參見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官網介紹,Permanent Exhibitions | KZ Gedenkstätte Dachau (kz-gedenkstaette-dachau.de)(瀏覽日期:2021/08/06)。

的史觀，將達豪集中營歷史分為三個階段：一、1933-1939年，達豪集中營做為消滅政治對手與共產黨的場域，並為納粹的壯大鋪路。二、1939-1941年，達豪集中營成為戰爭政策下的工具，開始屠殺佔領區的知識份子與蘇聯軍俘虜，並將體力衰弱、無法勞動的囚犯送往屠殺中心(killing center)。三、1942-1945年間，為了戰爭需求，迫使集中營囚犯於軍需工廠勞動，以及達豪集中營如何成為納粹各地集中營網絡中心的角色。展覽最後，則說明集中營在戰後的狀況以及紀念園區的歷史，並設有一間哀悼受難者、由民間組織所提供的、多達130個紀念牌匾以及記錄三萬多位受難者的紀念空間(圖6)。

除了上述主展區，另外有3個分別設立在不同建築物中的常設展區，分別為前焚屍爐展區(Former Crematorium)、前牢房展區(Exhibition in the Former Camp Prison)，以及營舍展區(Barracks Exhibition)。首先，園區保存了1940與1943年興建的焚屍爐，也就是所謂的X營區(Barrack X)，並以簡單的展板說明該區的功用(圖7)。前牢房展區則是納粹關押與刑求特殊犯人的個人牢房，例如罰站牢房(standing cell)，讓受難者在非常小的牢房內罰站長達72小時；該展區也搭配展板解說相關加害者及著名的受害者(圖8)，如1945年4月初於達豪集中營被處決的Georg Elser的經歷。Elser於1939年納粹



圖6. 由民間組織所提供，哀悼受難者的130個牌匾的紀念空間。(圖片來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授權提供)



圖7. 園區保存了納粹政權興建的焚屍爐，也就是所謂的X營區。(圖片來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授權提供)



圖 8. 前牢房展區是納粹關押與刑求特殊犯人的個人牢房，展板解說加害者及著名的受害者。(圖片來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授權提供)



圖 9. 紀念園區重建了兩棟受難者居住營舍 (圖片來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授權提供)

慶祝獲得政權的紀念日上，企圖於德國慕尼黑黑的啤酒屋設置炸彈謀殺希特勒，但功敗垂成後被捕<sup>12</sup>。

此外，過去受難者居住的營舍，因為戰後興建難民宿舍而都被拆除，所以紀念園區重建了兩棟營舍，並以木造上下舖來復原場景(圖9)。展板則說明原始設計可以容納 6000 人的營舍，如何隨著戰爭的推進，導致關押人數急遽增加而呈現擁擠不堪的狀況，直到 1945 年美軍解放集中營時，當時共有三萬名受難者被解放，容納人數遠超過原先規劃 5 倍之多。但重建的營舍顯得整潔雅致，並透過井然有序的展示呈現納粹違反人性的罪行；然而，這樣抽象化及美學化的展示手法，也為 Young (1993: 70) 所批評，他認為在這裡觀

眾無法目睹也難以感受到受難者從前在這裡生活的樣貌，但也或許正因為這樣的反差，正好提醒觀眾過去與現在的差距及時間流逝。

## 納粹大屠殺與人權教育

參觀集中營已經成為大屠殺教育 (Holocaust education) 及人權教育的一環。本文選擇將 Holocaust education 翻譯為納粹大屠殺教育(以下簡稱大屠殺教育)，而非尤太浩劫教育，是因為納粹大屠殺受害者中，雖以尤太族群人數最多，但也有其他族群的受害者，而這些也都是集中營博物館教育的一環。在西方，納粹大屠殺之歷史與人權教育，已經逐漸成為學校教

<sup>12</sup> 參見格奧爾格·艾爾塞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wikipedia.org) (瀏覽日期：2021/08/06)。

育的重要課題，而相關之研究與專書，也陸續出版 (e.g. Totten and Feinberg, 2001; Schweber and Findling, 2007)。Mihř (2015) 指出早期的大屠殺教育經常結合歷史的教學與倖存者分享，直到 1990 年代，大屠殺教育也在英國及加拿大逐漸成為獨立的學科 (Zimmerman, 2014)。1998 年，由瑞典首相發起，成立了國際大屠殺教育、記憶與研究合作機構 (Task For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Holocaust Education, Remembrance and Research，以下簡稱 ITF)，其宗旨為在世界各地，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促進對大屠殺的記憶，並分析為何發生大屠殺以及發生的內容。至 2015 年，ITF 全球已有 40 個政府、研究者與國際機構加入。另外，歐盟的基本人權機構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也與 ITF 密切合作，透過工作坊及教案編寫，推動大屠殺教育，並視其為人權教育重要的一環 (Mihř, 2015)。

雖然大屠殺教育日益受到重視，但各國的教學有不同的目標與重點。以英國及加拿大為例，其教學強調種族主義勝過反尤主義。在美國，其教育主要的目標為：認識大屠殺如何及為何發生，以及如何防止種族屠殺再發生 (Zimmerman, 2014)。在教案設計上，Totten 和 Feinberg (2001) 出版的“Teaching and Studying the Holocaust”一書，便收錄了 13 篇探討不同課題的文章，內容包括如何使用歷史檔案、口述歷史或文學、戲劇及音樂等不同媒材來進行大屠殺之歷史教育。Schweber 和 Findling (2007) 的“Teaching the Holocaust”一書，將教學分為 16 個單元，每個單元說明關於大屠殺的重要概念 (big idea) 並講解專有名詞，單元包括：1933 年以前的猶太人在歐洲的生活、移民努力及躲藏、進入集中營、加害者、合作者與旁觀者，以及後續影響等單元，每個單元除了說明教學重點，也列出各種資源，如倖存者的日記、

傳記、影片及網路資源等。

雖然大屠殺教育除了認識納粹大屠殺的相關歷史外，也會連結並強調當代課題；然而，也有學者認為大屠殺教育與人權教育在內容與目標上並不相同 (Chen, 2019)。例如，Mihř (2015) 認為大屠殺教育旨在讓學生認識大屠殺的歷史及受難者，以發展同理心及道德教訓 (moral lesson)，較少從制度層面討論大屠殺為何會發生，或者連接當代社會議題。而人權教育，則更重視當代議題的教學，並從中引導捍衛人權的行動。前者比較重視歷史的教學，後者則更強調賦權個人改善、促進公正平等的社會。因此，他認為雖然大屠殺教育可以提供歷史的案例，引導學生思考種族主義和極權主義對人權的危害，補充人權教育，但並無法完全實踐人權教育的內涵與理念。Zimmerman (2014: 82) 也提醒大屠殺教育也可能將猶太人塑造成永恆的受難者形象 (perpetual victims)，或者不小心反而強化學生反尤主義的態度，而納粹的殘酷暴行與大量的受難照片，也可能創傷化學生 (Short and Read, 2004)，這些都是教學上要留意的事項。

Wogenstein (2015) 則認為透過良好的課程設計，大屠殺教育提供了人權教育的具體案例，引導學生思考人權的課題，且同理心是學習人權及行動最好的因子與動機；許多大屠殺教育的教材，也連結當代的種族屠殺議題，並引領學生思考種族主義等重要課題。Eckmann (2010) 認為連接大屠殺教育與人權教育雖然是必要之舉，但很困難，除了因為認識大屠殺的歷史本身就非常的複雜，且歷史並非線性發展的，將大屠殺連接到當代人權課題上，也要小心不要讓學生誤以為歷史可以改寫或重新來過；歐盟基本人權機構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以下簡稱 FRA) (2010) 也提醒如果沒有良好的教學規劃，參觀大屠殺遺址也可能成為

工具性儀式 (instrumental ritual)。而人權教育所強調的認知、行動和以人權的方式進行人權教育這 3 個面向，Eckmann (2010) 認為大屠殺教育對於歷史與人權課題的認知方面，最有貢獻，而在人權實踐行動上，則較為困難。而目前集中營博物館最常帶領教學的方法，不外乎透過參觀導覽的方式進行，近年來部分集中營博物館也開始提供工作坊或半日到兩日的課程，供學校團體預約，以更多元的方法與角度帶領學校團體認識大屠殺的歷史與人權課題，以下進一步透過文獻回顧討論。

### 集中營博物館導覽及教育活動

集中營博物館在人權教育上可以扮演什麼角色與貢獻？是否展出過去殘害人權的相關歷史，就能達到人權教育的目的與功能？其中，導覽與教育活動對於大屠殺歷史及人權教育，又扮演什麼角色？在方法上，FRA 的報告書 (FRA, 2010) 認為參觀集中營首先聚焦在遺址的相關歷史學習，但教條式的說明並非最好的方法；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及主動式學習是關鍵，如讓觀眾主動選擇想要學習的課題與觀察文物及遺址等。其次，透過照片及日記等資

料，讓學生瞭解統計數字背後每個活生生的人，也有助於同理心的形成。最後，可以讓學生透過分組探索與報告等方式，產生自己的觀點與討論。

在實踐上，波蘭的 State Museum at Majdanek 結合參觀集中營並閱讀受難者 Jadewiga Ankiewicz 在集中營中所寫的日記，搭配其他的檔案與口述證言，讓學生分組討論不同的主題，如集中營的工作狀況或對猶太人的迫害，課程最後由同學分組帶領其他學生參觀日記中所描述的集中營遺址 (FRA, 2011b；陳佳利，2019)。布亨瓦德紀念館則發揮博物館教育文物觀察的精神 (Hooper-Greenhill, 1992)，讓參觀學生可以檢視真實的文物，並且發現這樣有助於促進他們的理解與參與。另外，搭配相關的檔案或公文，也有利於觀眾透過官方的資料證據，理解人權迫害事件發生時，官方或加害者的作為、方法與體制。但 FRA (2011b) 指出在運用文物於人權教育時要留意其教育內涵，許多加害者所製造的、具種族主義或歧視言論的宣傳文宣如果應用在教育活動中，就要特別留意教學的手法，以免造成負面的教育效果 (陳佳利，2019)。

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提供學校團體預約



圖 10. 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提供學校團體預約不同主題的工作坊課程 (圖片來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授權提供)

約不同主題的工作坊課程 (seminar) (圖 10)，工作坊除了導覽活動外，還安排學校團體事先瀏覽檢視達豪集中營所提供的照片，鼓勵學生描述照片中的人物與建築空間，思考照片所呈現的課題，例如照片是誰拍攝的？拍攝照片的目的為何？透過上述問題，引導學生反思集權主義與抵抗等相關課題，例如納粹政權如何拍攝宣傳照片來掩飾罪行，或受難者如何在圖書室中偷藏禁書來進行反抗等，並在導覽活動中穿插與講解學生所選的照片，或引導到相關展板前介紹照片內容，增進導覽與學生個人興趣的連結。近年來，為了吸引年輕人的興趣，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還規劃了漫畫工作坊，讓學生透過閱讀、討論及創作相關漫畫，來反思這段歷史，這樣結合年輕人喜好的工作坊，也廣受學校團體的喜愛<sup>13</sup>。

除了上述為學校團體規劃的工作坊，最常為觀眾及學校團體所應用的教育活動為導覽，導覽員就像扮演博物館與觀眾間的溝通大使 (FRA, 2011a)，而導覽員的素質、知識與溝通技巧，將大幅影響觀眾的參觀與學習經驗，然而目前相關的研究卻很少見，也是研究者關心的課題。其中，身為大屠殺教育者的 Blum (2004)，就曾報導他們一行人參觀奧斯維辛及比克瑙紀念博物館時，年輕的波蘭導覽員只專注在資訊的提供，對於團員的提問也鮮少回答，甚至產生防衛心，使得整個參觀經驗乏善可陳。相反地，研究者於 2014 年暑假參觀奧斯維辛及比克瑙紀念博物館時，由一位中年的波蘭婦女導覽，她一開始便說明自己身為波蘭人，而波蘭這個國家夾在兩大強權之間，既不喜歡法西斯主義，也不認同共產極權，身為導覽員，她希望能引導我們反思極權主義對人權的迫害，

並提醒團員在這裡任何嘻笑輕佻的行為，都是不適宜的。在導覽的過程中，她除了透過集中營中的建築遺址、展示文物與照片解說，敘述納粹政權是如何迫害犹太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外，最令研究者印象深刻的是，在比克瑙集中營焚化區前，她說明了由受難者所組成的樂隊，如何在納粹官員的要求下，演奏音樂目送自己的同胞與親人走進毒氣室，踏上死亡之旅。另外，她也在比克瑙留存的磚造營舍中，說明受難者有時候會為了一片麵包，發生爭執與搶奪。在這裡，導覽員問到：「我們可以用我們生活在和平世界的道德標準，來評斷他們嗎？」她三不五時地透過場景畫面的勾勒與提問，引發我們的反思，也呼應了 Levi 在書中所描述的，在集中營中人人都在偷盜，因為道德尺度在這裡已經改變了，而「政治壓迫幾乎必將催生一個難以界定的區域——一個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區域」(楊晨光譯，2017: 65)。

究竟，在集中營博物館中，該如何導覽呢？導覽的定義與原則為何呢？Tilden (許世璋、高思明譯，2006: 13) 對導覽下的定義如下：「透過原物的使用、直接的體驗，及輔助說明的媒介，以啟示其深遠意涵與關聯性為目的之教育活動，而不是僅傳遞確實的訊息而已。」Tilden (許世璋、高思明譯，2006: 13) 也對好的導覽提出以下 6 項原則：

一、任何解說其所展示或描述的內容，若無法與遊客的性格或經驗相連結，將會是枯燥乏味的。

二、解說雖是根據訊息而帶出的啟示，但訊息本身並非解說，兩者全然不同。然而，所有的解說都包含訊息。

三、無論其內容是關於科學、歷史或建築，解說是一種結合多種學科的藝術，

<sup>13</sup> 2021 年 8 月 21 日，透過線上 google meet 視訊會議軟體，訪問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博物館教育人員 Maximilian Luetgens 分享紀念園區的教育活動規劃與內容。

而任何藝術或多或少都是可傳授的。

四、解說的主要目的並非教導，而是激發 (provocation)。

五、解說強調的是整體的概念，而非零碎的片段。解說應針對全人 (the whole man)，而不是任何單一面相。

六、對 12 歲以下的兒童所做的解說，不是稀釋對成人解說的內容，而是需要有完全不同的做法。若欲達到最佳的效果，則需有自成一套的解說方案。

在集中營遺址中，研究者認為導覽員除了引導觀眾身歷其境之外，也必須引發對人權理念及人性的思考，例如帶領觀眾思考集中營中各種灰色地帶的人性課題，並引發觀眾的討論與互動。FRA (2011b) 研究發現，博物館經常聘僱具歷史專業背景的鐘點導覽員，並強調歷史知識的傳授。然而，該機構訪談學生發現，好的導覽只有傳遞歷史知識是不夠的，還必須能引發互動與討論。另外，學校團體預約導覽時最好要事先溝通，讓導覽員瞭解學生參訪前所具備的相關知識，才不會在導覽過程中重複述說已知的資訊，並適度保留時間，在老師及導覽員協助下，引導學生自行觀察遺址，更能加強學生主動學習的效果 (FRA, 2010)。另外，除了描述集中營的運作方式與歷史外，導覽員也應該透過照片及文物，引導觀眾思考加害者、旁觀者及受難者的經歷，分析加害體制的形成與社會大眾沉默旁觀的原因，才能達到人權教育的效果。Reardon (1995) 也指出帶領高中生思考種族屠殺課題時，除了瞭解形成種族屠殺的政治與社會背景外，也必須反思個人及社會的責任及道德選擇 (moral choice)。上述人權教育理念與導覽原則，也成為本文分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的導覽內涵與技巧之參考與依據。

## 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導覽內涵分析

如前述，位於前西德領土內的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遲至 1965 年才正式成立，並經由倖存者的努力而得以保存。紀念園區設有圖書館及檔案中心，提供研究人員使用，並設計了包含行前準備、導覽及參觀後的半日教學活動 (seminar)，提供團體預約。園區於 2003 年完成新的常設展，並規劃許多導覽及教育活動，而教育活動的規劃與實施，為本研究重點項目。然而，本研究原定於 2020 年至 2021 年間進行田野調查，但遭遇全球新冠肺炎肆虐，德國的博物館與紀念園區相繼休館停止開放，使研究者無法親自前往德國考察，改為分析線上教育資料，並透過視訊軟體，線上訪談負責培訓導覽人員及規劃教育活動的博物館教育人員 Maximilian Luetgens<sup>14</sup>，並於 2021 年 10 月 5 日，預約參加該館的 seminar 課程，由導覽員及教育人員為修習博物館教育課程的研究所同學進行線上講解與導覽。

根據訪談內容，Luetgens 分享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的教育理念是以學習及紀念為宗旨，並以學校團體及國際觀光客為主要的目標觀眾，希望透過各種教育活動，讓年輕的世代學習到國家社會主義 (social nationalism) 及種族主義如何摧毀民主，希望藉由園區的展覽及教育活動，紀念所有在達豪集中營的受難者及其後代。除此之外，研究也是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的重要工作內容，透過研究及口述訪談，不斷地還原及重構歷史真相。例如，曾經在達豪集中營被處決的四千名蘇聯軍俘虜，園區目前只有掌握約一千位受難者的姓名，因此，透過持續的研究，期待能早日完整建

<sup>14</sup> 2021 年 8 月 21 日，透過線上 google meet 視訊會議軟體，訪問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博物館教育人員 Maximilian Luetgens 園區的教育政策，以及導覽與工作坊規劃。

構受難者名單。另外，針對集中營中一些少數族群，如集中營性奴隸、耶和華見證人與辛提和羅姆人在達豪集中營的經歷與受害狀況，也持續展開相關研究。

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目前共有 17 位專職導覽人員，所有的導覽員均經過長達 6 個月的訓練課程，內容包括歷史、導覽技巧及當代課題等內容，Luetgens 強調因為主題的特殊性，也會特別提醒導覽員相關議題的敏感性，包括能夠分享與須避免的內容，以及如何尊重不同族群的觀點與感受。此外，也鼓勵導覽員針對不同國籍觀眾所關心的議題，來進行不同主題的研究與導覽規劃。例如，針對英美的參觀團體，發展出「1945 年集中營解放」的導覽內容，描述美軍如何解放達豪集中營，並從美國人的視角來見證這段歷史，這也是國際觀光客感興趣的課題；另外，包含結合宗教團體發展「達豪集中營的耶和華見證人」主題，讓不同背景的觀眾得以連結自身關懷。而園區針對上述不同主題的導覽內容需求，也會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以培訓導覽員。

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因應疫情，於 2020 至 2021 年閉館期間，幾乎每週推出

線上導覽，以同步錄影與播放的方式，讓導覽員親自帶領線上觀眾「參觀」集中營，並歡迎觀眾於線上提出問題，館員在收到提問時，會適時打斷導覽員並提問，力求讓觀眾體驗親自參觀的感受與互動（圖 11）。這一系列的線上導覽主題豐富，涵蓋達豪集中營的歷史、建築、受難者經驗與解放等課題，並有 8-10 場是以英文為導覽解說語言，存檔放在該館的臉書上，讓無法同步聆聽的觀眾可以透過線上資源，認識達豪集中營的歷史與受難者經歷。

本研究剔除錄影品質不佳或主題重複的導覽，選擇 7 場主題不同的英文線上導覽內容進行分析，分別為 2020 年 10 月 13 日「達豪集中營受難者的素描與繪畫」(Prisoners' Drawings and Paintings in th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2020 年 10 月 20 日「達豪集中營的妓院」(The Camp Brothel in th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2021 年 2 月 23 日「衣服與鞋子：帶給集中營囚犯羞辱與焦慮」(Clothes and Shoes. Humiliation & Agony of the Prisoners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2021 年 3 月 18 日「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營房」(The



圖 11. 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於 2020 至 2021 年閉館期間推出線上導覽，以同步錄影與播放的方式，讓導覽員親自帶領線上觀眾「參觀」集中營。（圖片來源／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授權提供）

Barracks of th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2021年5月2日「1945年集中營解放」(The Libera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1945)、2021年5月7日「國際囚犯委員會：責任、民主、兄弟情誼」(International Prisoners' Committee: Responsibility, Democracy, Brotherhood)，以及2021年7月27日「達豪集中營的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 at th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進行分析<sup>15</sup>，研究發現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的線上導覽有以下特色：

### 一、多元的主題與歷史基本資料的介紹

首先，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線上導覽主題內容豐富，涵蓋歷史、建築空間、不同背景的受難者經歷及解放等議題，反映園區持續性地針對各個議題進行研究並將成果轉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與受難者相關主題相當多元，紀念園區不只選擇達豪集中營中最令人矚目的政治犯及其能動性進行研究與解說，如國際受難者委員會的角色，此外，還有針對集中營中受迫害的少數族群與團體，如藝術家、耶和華見證人、女性性奴隸與同性戀等受難者，進行專題導覽與解說。Luetgens 訪談時提到，一般觀眾參觀時間有限，很難有時間聆聽這些特殊主題內容，線上導覽則突破了參觀時間的限制，讓導覽員可以針對

不同主題的研究成果進行分享。另外，無論導覽解說的主題為何，一般而言，導覽員都會先講解達豪集中營的基本資料，如成立的背景、關押人數、死亡人數與解放日期等，讓觀眾對納粹大屠殺歷史及達豪集中營所扮演的角色，有基本的概念與瞭解。

### 二、帶領觀眾神入不同的建築空間以心領神會

雖然線上參與導覽的觀眾無法真的走入集中營參觀，但導覽員善用各種平面圖與建築，帶領觀眾神入集中營的空間。一般而言，導覽員會選擇在戶外空間展開導覽，並且先透過平面圖與建築外觀，讓觀眾瞭解整個達豪集中營的空間配置，以及相關主題建築所在位置，如裁縫工廠或者關押囚犯的營區等。例如，在進行「達豪集中營營區」主題導覽時，導覽解說員除了詳細介紹營區的空間與使用情況，也解釋戰後集中營建築變遷及重建等論辯。接著，導覽員帶領線上觀眾進入營區，仔細解說受難者居住的空間，如何隨著戰爭的推移及大量從東歐轉移至此的受難者到來而日益惡化，重建後的營舍雖然如 Young (1993: 70) 所批評，顯得太過乾淨整潔，讓人難以想像感受當年受難者生活的樣貌，但隨著導覽員的描述，觀眾可以感同身受、逐步神入受難者的居住時空，想像

<sup>15</sup> 參考官方臉書，線上導覽網址分別為：

2020年10月13日 (20+) Prisoners' Drawings and Paintings in th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 Facebook

2020年10月20日 (20+) The Camp Brothel in th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 Facebook

2021年2月23日 (20+) Clothes and shoes. Humiliation and agony of the prisoners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 Facebook

2021年3月18日 (20+) The Barracks of th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 (Online-Tour in English) | Facebook

2021年5月2日 (20+) The libera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1945 | Facebook

2021年5月7日 (20+) International Prisoners' Committee: Responsibility, Democracy, Brotherhood | Facebook

2021年7月27日 (20+) Jehovah's Witness at th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 Facebook

生活其中的處境。

另外，2021年10月5日研究者安排修習博物館教育專題的學生，預約參加該館的 seminar 課程，並同步聆聽線上導覽與解說，發現導覽員除了帶領學生參觀不同的建築空間並駐足解說外，來到毒氣室與焚屍爐區域時，導覽員只是靜默地透過鏡頭，引領學生走過這兩個區域；同時，修課的學生也發現鏡頭中其他正在現場參觀的觀眾，皆保持莊嚴與靜默，以表達對在此罹難的受難者的尊敬與哀悼，這樣的參觀態度與氛圍，也深深地感染了線上參與導覽的學生。

### 三、隨著歷史脈絡及時序推移進行解說

不論是哪一個主題導覽，基本上會隨著歷史脈絡與時間的推移進行講解，讓觀眾能隨著二戰的變化來瞭解集中營的管理改變與受難者處境。以「達豪集中營營區」主題導覽為例，導覽員說明早期的受難者生活條件較好，但隨著關押人數遽增以及德軍對俄戰爭失利後，生活與工作情況日益惡化，集中營開始加強囚犯的工作時間以生產更多的物資，導致許多受難者因過勞而死。而「解放」的主題更是集中描述 1945 年 4 月 29 日美軍解放前幾天，一日一日地描述集中營的狀況，尤其是國際委員會成員的抵抗以及美軍的抵達等，讓觀眾瞭解解放過程中，受難者並非全然被動以等待聯軍，而是以各種方式反抗與起義，講解並搭配引用目擊者及受難者的口述紀錄，讓整個解放過程栩栩如生。

### 四、搭配照片與口述內容，呈現不同背景受難者主體之敘事

隨著導覽內容的進展，導覽員會因應不同的課題，介紹不同國籍、背景與經歷

的受難者，並搭配照片與口述史來說明，此點符合 FRA (2010) 認為透過照片及日記等資料，讓學生瞭解統計數字背後每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的姓名、思想與感受，有助於形成同理心的論點。研究觀察導覽員所選擇解說的受難者，以具正面性的人物故事為主。例如在介紹集中營內的醫療課題時，導覽員指出雖然許多醫護都沒有受過專業醫療訓練，也經常以受難者進行各種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但她還是舉出具正面意涵的案例，說明主人翁如何透過假造病歷資料拯救許多受難者。在「達豪集中營的耶和華見證人」主題中，導覽員說明反戰的耶和華見證人如何拒絕為軍需工廠服務，而經常被分派廚師或理髮師等工作，部分耶和華見證人信仰者就利用職務之便，幫助其他受難者獲得多一點食物或暖氣。「解放集中營」的主題中，導覽員也介紹由受難者所組成的國際委員會成員，描述不同國籍的委員在集中營解放過程中所扮演的主動性角色。

除了準備許多受難者照片協助解說外，導覽員也經常穿插並唸一段受難者的口述內容，讓整個解說顯得更更有血有肉並充滿受難者的聲音，引領觀眾更深刻的瞭解他們的感受與處境；但在解說「達豪集中營的妓院」主題時，雖然有解釋這些女性多是被納粹視為反社會而被監禁並勸誘成為性奴隸，但只有引用一位女性受難者的口述內容，顯示該主題因社會的歧視，時至今日，仍很缺乏相關的第一手口述證言資料<sup>16</sup>。

### 五、呈現集中營內複雜的動態與階層關係

導覽員不只呈現受難者的能動性，也勾勒出多國受難者在這個集中營中複雜的動態關係。在導覽「達豪集中營營區」

<sup>16</sup> 被納粹視為反社會的女性包括同性戀者與妓女，而其他如酗酒者、智能不足及流浪漢，也都被歸類為反社會人士。

主題時，導覽員提到達豪集中營中是個充滿階級的空間，不同國籍的受難者受到不一樣的待遇。基本上，來自西歐及德國的政治犯受到比較好的待遇，也被分配到距離餐廳等設備較近的營舍，而東歐人及犹太人則經常處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中。其中，也有被選為管理員的「卡波」，協助管理其他受難者。根據受難者口述分享，這些「卡波」的殘酷程度比起納粹有過之而不及，是許多受難者可怕的夢魘。即使如此，導覽員仍舉出具體的人物故事，說明少數擔任「卡波」的受難者，會利用其權力協助其他人得到更多一點的食物或資源。分享這些案例，除了強調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也呈現出集中營中的階級與人際關係。

而在解說「國際囚犯委員會：責任、民主、兄弟情誼」主題時，導覽員除了仔細講解由囚犯所組成的委員會如何在美軍解放前後維持秩序，也透過會議紀錄及信件等檔案資料，說明委員會如何在這個宛如小型聯合國的集中營中，透過強調兄弟情誼的概念來克服仇恨及來自各國受難者的國族意識。例如，他們論辯是否應該邀請來自加害國家的受難者加入委員會，最後決定各邀請一位來自義大利與一位來自德國的抗納粹運動者加入，視他們為抵抗暴政的夥伴而不是納粹的同路人。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委員會也堅持實踐民主的信念，解放後將納粹黨衛軍集中關押，除了防止受難者報復也有利戰後司法審判的進行，因為他們相信唯有堅持司法正義而不是以暴制暴，才能換來穩固的民主與自由。這些因為國族與戰爭所交織出來的複雜動態關係，也透過導覽解說一一勾勒呈現在觀眾面前。

## 六、較少應用展覽展板與文物輔助導覽解說

根據觀察，不論哪一個主題的導覽

員，手上都準備了厚厚的檔案夾資料與照片，輔助解說的進行。相較之下，應用展覽文物與展板來進行解說的情況就比較有限。整體而言，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的常設展以照片與文字為主，展板以黑、灰、白三色為主，穿插懸掛在以灰色為主色調的建築牆面與空間中，顯得簡潔且莊重。解說員經常使用自己準備的照片與圖表資料來進行解說，偶爾也會以展板照片或模型來介紹個別加害者或受難者，而一般博物館教育強調的文物觀察則較少被應用在解說中，這也可能是因為展出文物並不多所致。

較為例外的是，在解說「衣服與鞋子：帶給集中營囚犯羞辱與焦慮」主題時，導覽員應用展櫃中的衣服與鞋子，讓觀眾觀察受難者的穿著，並瞭解許多人連一雙真正的鞋子都沒有，經常是左右大小不一的木屐，或者是男孩穿女孩的鞋子；該主題也特別關注女性受難者的工作情況，並引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女性受難者的口述內容，聲稱有近五成的女性根本沒有鞋穿，而沒有適當的鞋子正是受難者死亡的開始。而在解說「達豪集中營受難者的素描與繪畫」主題時，導覽員會帶領觀眾觀看展板上呈現的受難者藝術作品，並說明在集中營中的創作，可以分為受難者的秘密創作及納粹官方特准的藝術家創作。前者創作內容多為描述集中營中的苦難場景，或者納粹視為墮落藝術的抽象繪畫；後者則以人物素描或花草繪畫為主要創作內容。

## 七、透過建築空間、分類與歷史事件呈現加害體系

相較於受難者主體性的呈現，導覽解說對於加害者個人的描述較少，而是以建築空間、歷史事件與法規命令等呈現加害體系，而引用加害者觀點也只是輔佐解釋這套體系的運作。例如，帶領觀眾走進前

牢房展區，說明納粹如何對特定受難者，以獨居的牢房進行隔離並施以酷刑，而許多導覽主題也會應用展板介紹納粹政權對受難者的分類：如政治犯、一般罪犯、犹太人、同性戀及反社會者如何在衣服上縫製配戴不同顏色的符號，而透過這一套分類系統，也加強了社會的歧視與偏見<sup>17</sup>。

另外，應用歷史事件建構加害體系，也是納粹政權擅長的策略。在「達豪集中營的耶和華見證人」主題中，導覽員介紹了納粹如何因為 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而崛起，並說明其如何利用國會大樓被焚燒的事件頒佈緊急命令、限制人民言論與集會自由等《威瑪憲法》(Weimarer Verfassung) 所賦予的基本權利，並允許政府可以逮捕人民或沒收財產等侵害人權的行為。在這樣的背景下，拒絕於軍隊服役的耶和華見證人信仰者開始遭到迫害。雖然，他們可以透過宣示放棄信仰就可以獲得釋放，但只有一成左右的人妥協，並用各種方式幫助其他受難者而受到敬重，就連加害者也對他們有相當正面的評價。在這個主題的導覽中，導覽員不但帶領觀眾到個人牢房區，說明對這些特殊受難者所施以的雙手反綁吊掛的酷刑，也罕見地引用了加害者證言，也就是達豪集中營的第一任指揮官的回憶錄說明：「耶和華見證信仰者基本上非常值得信任且工作認真，他們不願意做任何與軍事活動有關的工作，他們固執地只想受苦。」

## 八、有限度地連結當代紀念活動與世界局勢

人權教育強調將歷史事件與當代人權議題的連結，並反思歧視、種族主義或

性別等議題，但分析達豪紀念園區的英語導覽解說內容，這樣的連結並不多見。一方面是因為大屠殺與集中營的歷史相當複雜，所以解說內容經常聚焦在相關歷史與受難者經驗，時間點也關注在 1933 年納粹政權崛起到 1945 年戰敗為止。連結到當代社會主要是以園區所舉辦的紀念活動，並以出席倖存者的感想與回憶來呼應歷史。少數觸碰到當代議題的有：解說集中營妓院主題時，提到這些被迫在集中營妓院工作的女性，許多都是被納粹政權標示為反社會份子，如性工作者與遊民等；戰後，也因為擔心社會的歧視而持續噤聲；而導覽「國際囚犯委員會」主題到尾聲時，導覽員除了說明國際囚犯委員會已經體認到司法正義對民主國家的重要性，也認為這樣超越國界、以各國人士所組成的國際委員會意義深遠，也體現在現今歐盟的成立，並維持了二戰後歐洲長久的和平。

## 討論與結論

Macdonald (2013) 認為關於納粹大屠殺的記憶，隨著 1970 年代以來的影視熱潮，已經成為跨國界、跨疆域的集體記憶，且已經逐漸脫離特定的歷史時空，而成為永恆的道德教訓，並構成人權論述的核心；但她同時也指出，對大屠殺的反思與詮釋，也形塑歐洲各國的國族認同與集體記憶。例如，英國於 2001 年訂立了「大屠殺紀念日」(Holocaust Memorial Day)，並在各地舉辦紀念活動，一方面歌頌英國在二次大戰中，解放 Bergen-Belsen 集中營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呈現英國在二戰

<sup>17</sup> 納粹在受難者的衣服上縫上三角形臂章以進行分類，常見的有：紅色代表政治犯（如共產主義份子與反納粹份子），黑色代表反社會人士（包含智障人士、妓女與遊民等），綠色代表一般的罪犯，而粉紅色代表性犯罪者（包含男同性戀與雙性戀者），紫色則代表耶和華見證人，而兩個相疊的黃色三角形代表犹太人。詳見維基百科：納粹集中營臂章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wikipedia.org) (瀏覽日期：2021/10/21)。

前後收容了許多難民，彰顯英國是個多元文化兼容並蓄的國家。相似地，本文研究的達豪集中營，其保存紀念的過程，也受到地方居民、美軍與倖存者間的角力，並於二戰後在駐守美軍的支持下，從設立小型展覽開始，到 1955 年解放 10 週年活動時，在受難者組成的 CID 委員會推動下，逐步強化保存集中營遺址的主張，終於促使巴伐利亞政府決定保存納粹政權所設立的第一個集中營，並在 1965 年正式成立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設置了常設展且規劃各種導覽與教育活動。在這個過程中，解放達豪集中營的美軍以及來自各國的受難者所組成的委員會，一直扮演著關鍵性的力量，並成為這段歷史集體記憶的主要保存與敘述者。

2015 年，達豪集中營舉行解放 70 週年紀念活動，邀請年事已高的倖存者及解放的美軍參加紀念活動，除了再次肯定美軍解放達豪集中營的功勞，德國總理梅克爾在會中也對受難者表達哀悼之意，並感謝倖存者透過自身的見證，對教育推動所做出的貢獻。隨著倖存者逐漸凋零，關於納粹違反人權的暴行及記憶，並未因此而漸漸消失，而是透過不義遺址的保存、展覽與導覽教育活動，成為德國人歷史教育與民族意識的一環，並以此做為反省與重生的力量。認識到集中營遺址對於大屠殺歷史教學與人權教育推動的潛能，導覽與教育活動便成為民眾與學生認識這段歷史與學習人權教育的重要一環。其中，導覽員如何在複雜的歷史事實中，運用有限的時間與各種資源，解說歷史與傳承受難者記憶，揭露其中所隱含的人權教育訊息，讓違反人權的歷史能夠連結當代人權議題

## 參考文獻

李金瑾，2015。黑暗觀光景點的歷史詮釋與形象塑造比較：以達浩集中營紀念館、薩克森豪森紀念博物館與奧茲維辛 - 比克瑙國家博物館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

並成為人權教育的養份，也成為許多不義遺址所面臨的挑戰。

本文透過線上導覽及 seminar 的內容分析，研究發現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的 seminar 課程，應用照片與學生團體的興趣產生連結，符合 Tilden（許世璋、高思明譯，2006: 13）提出好導覽的首要原則，須與遊客的性格或經驗相連結。另外，導覽內容以應用遺址建築與口述歷史進行歷史解說為主，雖然較少連結到當代人權課題，但以受難者為主體的各個主題導覽，有助於揭開這段複雜歷史的各個面向、角色與動態，包括加害者體制的形成與其對人權迫害所採取的手段，以及受難者所採取的抵抗與能動性；而導覽特別強調受難者跨國界之互助合作與抵抗，解放後對司法正義的堅持而非採取報復性的暴力，更有鼓舞觀眾未來對抗不義與違反人權事件之動能。另外，各種較受忽視與邊緣的聲音，如女性性奴隸與同性戀者的處境，也透過研究與導覽逐漸呈現在觀眾面前，有助於觀眾連結這些屬於邊緣的、多元性別的族群與團體，在歷史與當代社會所遭遇的相似處境與歧視，提供反思當代人權課題的重要養份。

## 誌謝

本研究要感謝達豪集中營紀念園區教育人員 Maximilian Luetgens 接受訪談並協助線上 seminar 課程的實施，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特此致謝。本研究為科技部「集中營博物館展示與人權教育之研究：德國與波蘭的案例 (I)」研究計畫成果，計畫編號 MOST 108-2410-H-119-006。

- 觀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林蕙玟，2010。關於猶太浩劫之痛苦過去的「回想」與「遺忘」：歷史現場作為創傷文化遺產的省思，文化資產保存學刊，13: 5-18。
- 花亦芬，2016。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圓神出版社。
- 施亦如譯，Ryden SJ, E. (雷敦蘇) 原著，2013。導讀，收錄於漢娜·鄂蘭《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臺北：玉山出版社。
- 許世璋、高思明譯，Tilden, F. 原著，2006。解說我們的襲產。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 陳佳利，2007。被展示的傷口。臺北：典藏出版社。
- ，2019。博物館人權教育活動規劃策略與實踐方案：加拿大人權博物館個案研究，博物館學季刊，33(1): 5-23+25。
- 楊晨光譯，Levi, P. 原著，2017。被淹沒與被拯救的。北京：中信出版集團。
- 劉仁章，2017。辛德勒名單，旅客的清單：尤太集中營的觀光經驗。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觀光與餐旅管理碩士班碩士論文（未發表）。
- Blum, L., 2004. The Poles, the Jews and the Holocaust: Reflection on AME Trip to Auschwitz.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3(2): 131-148.
- Carter, J. and Orange, J., 2012. Contentious terrain: Defining a human rights museology.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7(2): 111-127.
- Chen, C.-L., 2019. Introducing human rights education within a memorial museum framework: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Taiwan's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34(6): 562-576.
- Eckmann, M., 2010. Exploring the relevance of Holocaust education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 *Prospects*, 40: 7-16.
- FRA, 2010. Excursion to the Past-Teaching for the Future: Handbook for Teachers on the Holocaust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Download from the website (Dec. 15, 2016): [http://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1218-Handbook-teachers-holocaust-education\\_EN.pdf](http://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1218-Handbook-teachers-holocaust-education_EN.pdf).
- ，2011a. Discover the past for the future: The role of historical sites and museums in Holocaust education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n the EU. Download from the website (Sep. 16, 2013): [http://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1791-FRA-2011-Holocaust-Education-Main-report\\_EN.pdf](http://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1791-FRA-2011-Holocaust-Education-Main-report_EN.pdf).
- ，2011b.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t Holocaust Memorial Sites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Download from the website: [http://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1790-FRA-2011-Holocaust-education-over](http://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1790-FRA-2011-Holocaust-education-over).
- Goh, R. B. H., 2018. Memorializing genocide: Embodied semiotics in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 *Social Semiotics*, 28(1): 18-40.
- Hooper-Greenhill, E., 1992.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 Kaminsky, A. (Ed.), 2019. *Museums and Monuments: To the Memory of the Victims of Communist Dictatorship*. Dresden: Sandstein Verlag.
- Lennon, J. and Foley, M., 2010. *Dark Tourism*. Hampshire: Cengage Learning EMEA.

- Macdonald, S., 2009.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London: Routledge.
- , 2013. *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 London: Routledge.
- Marcuse, H., 2001. *Legacies of Dacha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hr, A., 2015. Why Holocaust education is not always human rights educatio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14: 525-544.
- Mitchell, P., 2018. Concentration camp building as artifacts: The archaeology of buildings in the Mauthausen-Gusen Comple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22(3): 553-573.
- Reardon, B. A., 1995. *Educating for Human Dignity: Learning abou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aidel, R. G., 2004. *The Jewish Women of 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chimal, 2020. Dachau 1965: Metaphorical exhibition making at the memorial site.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 24(1): 59-78.
- Schweber, S. and Findling, D., 2007. *Teaching the Holocaust*. Los Angeles: Torah Aura Productions.
- Short, G. and Read, C. A., 2004. *Issues in Holocaust Education*. Bodmin, Cornwall: Ashgate.
- Sofsky, W., trans. Templar, W., 1999. *The Order of Terror: The Concentration Camp*.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otten, S. and Feinberg, S. (Eds.), 2001. *Teaching and Studying the Holocaust*. MA: Allyn & Bacon.
- Wachsmann, N., 2010. The dynamics of destruction. *In: Caplan, J. and Wachsmann, N. (Eds.), 2010, Concentration Camps in Nazi Germany: The New Histories*, pp. 17-43. London: Routledge.
- White, N. R., 1998. Making absences: Holocaust testimony and history. *In: Perks, R. and Thomson, A. (Eds), 1998,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pp. 172-182. London: Routledge.
- Wogenstein, S., 2015. Holocaust education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 reconsidered: A response to Anja Mihr.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14: 545-553.
- Young, J. E., 1993.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8. *Writing and Rewriting the Holocaust: Narrative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Interpretati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Zimmerman, L. W., 2014. *Jewish Studies and Holocaust Education in Poland*.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12日；接受日期：2022年1月10日

#### 作者簡介

陳佳利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

#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nd Difficult Heritag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 Site Preservation, Guided Tours, and Interpretation

Chia-Li Chen\*

Manuscript received October 12, 2021; accepted January 10, 2022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uman rights museology and museums have flourished. Presenting the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achieving the goals of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re important missions of such museums. As authentic evidence of Nazi war crimes, concentration camps have been preserved and transformed into museums and memorials in Germany, attracting school groups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ts. What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programs do these memorial sites provide? How do they facilitate visitor learning, in relation to human rights education, through guided tours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

As the first concentration camp established by the Nazis, the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 Site serves as the case study.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ts preservation and exhibitions is provided. Online interview with the museum educator was conducted and online guided tour content and educational program planning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ent of school seminars of the museum is able to successfully connect with student interests and photographs and comics can be used to inspire discussion. In terms of the themed online guided tour content, although not very relevant to contemporary human rights issues, Holocaust victims are the subjects of narration. Their active resistance and the roles of different actors, such as the perpetrators and their system of violence, are presented to enable visitors to understand complex history in a dynamic context. The guided tour content also emphasizes the collaboration of victims across nations and their insistence on fighting for justice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to empower visitors to combat injustice. Moreover, marginalized groups, such as sex slaves and homosexuals, are given a voice. As such, visitors can compare the prejudices of past society with thos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ink about human rights issues.

Keywords: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 Site, the Holocaust, concentration camp guided tour, concentration camp exhibition, museums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 chiali21@hotmail.com

